

研究論文

趨近－迴避框架下的虛假健康資訊應對： 一項針對醫學生的調查研究

閆雋^a、李宗亞^{a*}、莫凡^a、武丹萍^a、周雨萌^b

^a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武漢市，中國大陸

^b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北京市，中國大陸

摘要

新冠肺炎繼「非典」之後再次使訊息疫情成為全球治理的共同難題。社交媒體加劇了海量虛假資訊與有限的抵抗軍之間的兵力懸殊。兼具醫學知識和新媒體技能的醫學生是潛在的虛假資訊抵抗力量，對他們應對行為的研究能夠為訊息疫情治理提供新思路。本研究對華中地區某大學醫學院的1,500名醫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呈現了他們使用社交媒體「主動對抗」和「被動防禦」虛假資訊的心理機制。研究基於趨

閆雋，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副教授。研究興趣：健康傳播、醫學社會學、新聞生產與社會。電郵：junyan@hust.edu.cn

李宗亞（通訊作者*），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副教授。研究興趣：健康與風險傳播、資訊處理與媒介效果。電郵：lizongya@hust.edu.cn

莫凡，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興趣：健康傳播。電郵：1041462126@qq.com

武丹萍，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興趣：健康傳播。電郵：wudanping@hust.edu.cn

周雨萌，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興趣：健康傳播。電郵：1425840907@qq.com

論文投稿日期：2023年11月20日。論文接受日期：2024年7月29日。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2期(2025)

近一迴避理論框架展開探討，發現綜合社交媒體使用與醫學資訊網站使用通過影響醫學生有關虛假資訊的感知威脅與感知效能，間接影響其對虛假資訊的主動對抗與被動防禦的行為取向。此外，我們也探究了媒介使用與虛假訊息應對行為之間的中介效應是否受到集體主義的調節。本研究豐富了動員具備科學知識的「Z世代」參與訊息疫情治理的理論視角，拓展了社會合力促進「全健康」理念在中國實現的可行路徑，科學化、精準化了智能傳播時代管理者應對訊息疫情的治理模式。

關鍵詞：虛假資訊、醫學生、趨近－迴避框架、社交媒體、集體主義

Research Article

An Approach-Avoidance Framework of Coping with Health-Related Misinformation: A Survey of Medical Students

Jun YAN^a, Zongya LI^{a*}, Fan MO^a, Danping WU^a, Yumeng ZHOU^b

^a Journalism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chool,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Mainland China

^b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Mainland China

Abstract

COVID-19 once again presents the infodemic as a worldwide problem after the outbreak of SARS. We are making progress in the fight against health-related misinformation, but mass participation and active engagement are far from adequate. With a focus on medical students—who are pre-professionals

Jun YAN (Associate Professor). Journalism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chool,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interests: health communication, medical sociology, journalism sociology. Email: junyan@hust.edu.cn

Zongya LI (Associate Professor; Corresponding Author*). Journalism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chool,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interests: health and risk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media effects. Email: lizongya@hust.edu.cn

Fan MO (Master's Student). Journalism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chool,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interest: health communication. Email: 1041462126@qq.com

Danping WU (Master's Student). Journalism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School,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interest: health communication. Email: wudanping@hust.edu.cn

Yumeng ZHOU (Master's Student).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 health communication. Email: 1425840907@qq.com

Article History: Received on 20 November 2023. Accepted on 29 July 2024.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72 (2025)

with above-average medical knowledge, our study applies the approach-avoidance model of coping to examin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they engaged in active or passive defense against misinformation in the social media environment. A survey of 1,500 medical students revealed that the use of general social media and medical information sites had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ir perceptions of threat and efficacy related to misinformation. Moreover, we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mediation effects of these perceptions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edia use and actions against misinformation were moderated by collectivism.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mobilizing Generation Z with scientific knowledge to participate in the fight against misinformation, expands the path for achieving the goal of “one health,” and improves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infodemic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Keywords: misinformation, medical students, approach-avoidance framework, social media, collectivism

引言

傳播技術革命推動和實現了社交媒體與日常生活的嵌融，人們傳遞與獲取資訊的方式因之發生巨變(Xiao et al., 2021)。社群媒體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間於訊息接收與傳遞上有重要的功能(陳憶寧，2023)，但虛假資訊特別是健康虛假資訊也因而疾速滋生，導致「訊息疫情」的治理難度與日驟增。這不僅極大威脅了個體與公共健康，也破壞了公共信任與社會安定(Rodgers & Massac, 2020)。

虛假資訊指未經確認是否具有誤導意圖的非事實性資訊，包括捏造的新聞、篡改或編造的視頻或者圖片、未經核實的突發信息以及片面的事實資訊等(Koo et al., 2021; Zhou & Zafarani, 2020)。科學家等專業人士無疑是對抗虛假資訊的中堅力量和理想人群，已有的研究也表明，專家群體對於虛假資訊的糾正效果要優於非專家群體(Vraga & Bode, 2017; Zhang et al., 2021)。但面對海量的社交媒體資訊，他們的努力杯水車薪(Vraga et al., 2022)。因此，更多的公眾參與特別是具備專業醫學知識、訓練有素的「準醫生」的參與就顯得尤為重要。

相較於職業人群，醫學生時間相對充裕，更熟悉和擅長使用社交媒體(Turner, 2015)，是對抗網絡虛假健康資訊的巨大潛在力量。無處不在的虛假資訊使得醫學生時時刻刻面臨著「挺身而出」或「袖手旁觀」的兩難選擇：他們可以選擇「趨近」(approach)路徑來主動糾正虛假資訊(Gan & Fu, 2022; Liu et al., 2021)；或者選擇「迴避」(avoidance)路徑對虛假資訊視而不見，獨善其身(Deline & Kahlor, 2019; Sweeny et al., 2010)。

既往研究表明，醫學生在健康闢謠、社區保健及家庭健康教育中被賦予期望和信任，他們的專業知識和溝通策略成為遏制疫苗謠言傳播的有效力量(Frisch et al., 2022)。新冠大流行期間，亦有研究關注到醫學生加入人手短缺的重症監護室，擔任線上諮詢服務助手的臨床效果與社會意義(Passemard et al., 2021; Tempski et al., 2021)。有鑒於此，激發醫學生更為積極主動地參與虛假資訊治理對於遏制訊息疫情的傳播擴散以及構建數位社會良好傳播秩序顯得尤為必要且可行。

本研究通過對華中地區某大學醫學院的1,500名醫學生的問卷調查，探尋了他們應對虛假資訊的心理機制與路徑選擇。研究採用「趨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2期（2025）

近－迴避模型」(approach-avoidance model) 審視醫學生在社交媒體環境中主動對抗和被動防禦虛假資訊的不同路徑機制，企盼為訊息疫情治理中提升公眾參與的積極性提供決策參考和干預依據。此外，本研究還區分了綜合社交媒體使用和醫學資訊網站使用對醫學生虛假資訊感知與應對的差異化影響，這對於傳統媒介效果研究視角的邊界和內涵均構成了拓展和深化。

文獻綜述

趨近、迴避與虛假資訊應對

「趨近與迴避」相關的研究近年來聚焦於網絡社會人群的威脅應對等議題，成為一種解釋人類應對創傷、威脅與壓力等的基本反應的經典理論視角(Roth & Cohen, 1986)。趨近是指主動對抗風險刺激及其後果應對威脅；而迴避是指通過被動防禦(如忽略威脅性的資訊或者保持緘默)躲避威脅(Hofmann & Hay, 2018; MacIntyre et al., 2020)。既往的研究囿於日常風險語境，例如互聯網使用過程中的風險資訊趨近與規避(Deline & Kahlor, 2019; Goodall & Reed, 2013)、Facebook上的廣告參與和迴避(Kelly et al., 2020)，以及社交媒體上疫情新聞的獲取與規避(de Bruin et al., 2021; Park, 2019)等，關於特殊情境以及特定人群的靶向型研究仍有較大開展的空間。

新冠疫情期間，公眾比平時更加依賴社交媒體獲取相關資訊(Abbas et al., 2021; Kim et al., 2020)，虛假資訊接觸又會進一步引發人們的後續行為，例如虛假資訊被分享傳播之後，一些人會選擇對虛假資訊予以辯駁(魏然等，2022)；醫務人員也如出一轍(Bautista et al., 2022a; Negi, 2021)。社交媒體依賴則增加了人們接觸到虛假資訊的風險(Viswanath et al., 2020)，本研究將「趨近－迴避」模型置於虛假資訊語境下進行探討：人們通過糾正與舉報虛假資訊(Vraga & Bode, 2020a; Yang et al., 2022)進行「主動對抗」，可視為趨近導向；人們對虛假資訊視而不見或保持緘默(Dai et al., 2020)進行「被動防禦」，隸屬於迴避導向。本研究還進一步嘗試探索在社交媒體日益分眾化和多元化的背景

趨近－迴避框架下的虛假健康資訊應對

下，綜合社交媒體使用與醫學資訊網站使用是否會對醫學生虛假資訊的相關感知與行為取向造成差異化影響。

網絡媒體使用與感知威脅

感知威脅是指個體對存在於外界的各種客觀風險的主觀感受與認知 (Mahmood et al., 2021)。虛假資訊本身就是一種客觀風險，特別是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虛假資訊甚至作為一種元風險 (meta-risk) 在與疫情原始風險的相互作用下加劇了公眾對原始風險的認知複雜化 (Krause et al., 2020)。新冠疫情和虛假資訊的並行衝擊觸發了公眾的困惑和恐慌，並且加劇了知識鴻溝，撕裂了社會共識，導致了懷疑、不信任和非理性行為的頻頻發生 (Rocha et al., 2021)。

與社交媒體相比，醫學資訊網站通常提供更多與醫學、健康等專業有關的資訊 (Denecke, 2015)，如疾病常識和診療經驗等 (Wicks et al., 2010)；並為醫患提供互動交流平台 (Denecke & Nejd, 2009; Grindrod et al., 2014)。Vydiswaran 與 Reddy (2019) 觀察到線上健康論壇成員 (包括潛水用戶、論壇訪客、新手用戶、醫護從業人員與行業專家) 在進行交流時，健康資訊相較而言呈現出更高的資訊品質與可信度 (Denecke & Nejd, 2009)，虛假健康資訊的含量與濃度均低於綜合社交媒體平台。

由於公眾在綜合社交媒體上比在醫學資訊網站上接觸到虛假資訊的可能性更高，因而受到虛假資訊誤導與傷害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我們推測綜合社交媒體使用比醫學資訊網站使用更能激發醫學生群體有關虛假資訊的感知威脅：

假設 1：與新冠疫情相關的綜合社交媒體使用比醫學資訊網站使用更能顯著正向預測醫學生群體有關虛假資訊的感知威脅。

網絡媒體使用與感知效能

公共衛生危機期間的網絡媒體使用不僅能提高公眾對於虛假資訊的感知威脅，也有望增強公眾應對虛假資訊的感知效能 (Mahmood et al., 2021; Niu et al., 2021)。感知效能是指個人認為自己有能力採取行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2期（2025）

動去應對挑戰與困難的信心程度 (Bandura, 2001)。具體到虛假資訊應對語境，本研究將感知效能界定為面對社交媒體上的虛假資訊時，個體對於自己能夠評估、識別和糾正虛假資訊的能力的信心程度。

新冠疫情期間，大量醫學健康相關資訊如臨床指徵、診斷標準、預防與治療措施等在網絡上的傳播促進了個人健康管理與決策的達成 (Niu et al., 2021)。同時，線上事實核查工具和輔助查證資源 (如中國互聯網聯合闢謠平台、騰訊新聞較真平台等) 也為公眾識別虛假健康資訊 (Kim et al., 2022) 提供了技術支持。有鑒於此，網絡媒介可能會通過增加人們的疫情知識儲備與提供有力技術工具增強用戶應對虛假健康資訊的感知效能。

醫學生在醫學資訊網站比在綜合社交媒體上能夠獲得更多可靠的疫情相關資訊與健康知識 (Moorhead et al., 2013; Ventola, 2014)，這使得他們相信自己相較普通人具備更充沛的識別與糾正虛假資訊的能力。因此，我們假設，醫學資訊網站使用比綜合社交媒體使用更能增強醫學生群體應對虛假資訊的感知效能：

假設2：與新冠疫情相關的醫學資訊網站使用比綜合社交媒體使用更能顯著正向預測醫學生群體應對虛假資訊的感知效能。

網絡媒體使用驅動虛假資訊應對的中介路徑探究

經典健康傳播理論如保護動機理論 (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PMT; Rogers, 1975) 與擴展並行處理模型 (extended parallel process model, EPPM; Witte, 1992) 均將感知威脅與感知效能作為核心變量納入考察。後續實證研究也在此基礎上繼續深入探究威脅與效能感知在外界信息刺激與個體行為反應關係之間的中介效應 (Krieger & Sarge, 2013; Lin et al., 2022)。有鑒於此，本研究試圖考察與虛假健康資訊相關的感知威脅與感知效能在網絡媒體使用與虛假資訊應對行為關係之間的中介作用是否顯著。

風險社會情境中，感知威脅對應對行為的影響已經收穫了廣泛的學術關注 (Brewer et al., 2007; Motta Zanin et al., 2020)，但相關影響機

趨近－迴避框架下的虛假健康資訊應對

制的研究尚未達成共識 (Chaffee & Roser, 1986; Schneider et al., 2021)：有的學者發現高威脅感知會觸發積極風險防禦行為，如主動接觸風險資訊、積極對抗風險等 (Chi et al., 2021; Coelho et al., 2020)，亦有學者認為較高的威脅感知會觸發人們的被動應對，如對威脅性資訊視而不見 (Song et al., 2021)。

用戶在社交媒體環境中接觸到虛假健康資訊，這些資訊會對其造成心理威脅。面對虛假訊息的威脅，有的用戶可能會選擇趨近導向的積極策略，如主動糾正虛假資訊 (Chen & Tang, 2023)。這種積極對抗可以有效減少虛假資訊的濃度，保護弱勢群體免受虛假資訊誤導，促進積極的「我們」聯合體的形成 (Muhlmann, 2008)，既有利於個體也有益於公眾 (Hwang et al., 2020)。

與此同時，有的用戶可能會選擇迴避策略，如忽視虛假資訊或保持緘默 (Deline & Kahlor, 2019; Han et al., 2018)。這與既往研究中人們迴避與癌症有關的資訊從而減輕心理壓力具有相似性 (Chae & Lee, 2019)。迴避式應對能夠節省人們的時間、精力和資源 (Sweeny et al., 2010; Williams, 2021)，減輕應對資訊風險的心理壓力與焦慮情緒。

綜上所述，社交媒體使用可能通過影響受眾對於虛假資訊的威脅感知進而影響其對虛假資訊的應對策略，基於過往研究，感知威脅既可能觸發醫學生主動糾正、舉報虛假資訊，亦可能觸發醫學生對於虛假資訊的迴避與漠視。據此，我們做出如下假設：

假設3：感知威脅在綜合社交媒體使用與醫學生對於虛假資訊的

(a) 主動對抗行為與 (b) 被動迴避行為的正向關係中起中介作用。

傳染病的流行突顯了醫療工作者作為公共衛生訊息傳播者的不可或缺。醫學教育應當使「Z世代」具備與社區溝通並就醫療保健提供建議的技能和信心 (Frisch et al., 2022)，從而展現出更積極和主動的姿態。

EPPM模型 (Witte, 1992) 指出，更高的效能感知可以促進適應性行為 (adaptive behavior) 的採納。近期採用EPPM模型對疫苗接種意願和防疫政策採納進行調查的研究顯示，感知效能的增強可以有效提高疫苗接種意願 (Gidado et al., 2024; Koskan et al., 2024) 與防禦措施採納行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2期（2025）

為 (Patte et al., 2022)。也有研究發現，認為自己能力很強並具備足夠知識的人更有可能採取積極主動的措施來應對風險 (Song et al., 2023)。因此，我們認為感知效能作為一種驅動力可以讓醫學生在應對虛假資訊時採取更主動積極的措施。

主動抵制虛假資訊包括履行核實與糾錯的行為 (Chen & Tang, 2023)，這意味著個體需要擁有更高的知識水平與更強的技術工具使用能力。醫學資訊網站為人們提供了豐富的知識和事實核查資源，可以提高一個人在評估和識別虛假資訊方面的效能感知。也就是說，醫學資訊網站使用可能會通過增強用戶的感知效能進而促進其對虛假資訊的積極抵抗。

假設4：感知效能在醫學資訊網站使用與醫學生對於虛假資訊的主動對抗行為的正向關係中起中介作用。

集體主義的調節效應

社交媒體作為公共空間中的訊息源流和眾意平台，許多人將其作為獲取和學習包括醫療訊息在內的科學知識的主要渠道。這些科學訊息來源不明、質量不佳、在事實上多數存在錯漏，未經事實核查或未被引用，通常會導致誤解 (Vraga & Bode, 2020b)、群體焦慮和恐慌 (Sharma & Hasija, 2022)，甚至威脅民族健康和國家公共衛生安全 (Ismail et al., 2023)。

虛假資訊的糾正因而顯得非常必要。這種利他行為意味著需要行動者投入時間和精力成本，保護弱勢群體不被虛假資訊誤導、誘騙，令更多社會成員獲益 (Malik et al., 2023; Zhao et al., 2016)。實證研究表明，集體主義可以促進健康危機背景下的親社會行為，例如遵循防護建議 (Maaravi et al., 2021)，為有需要的人提供物質、資訊或情感支援等 (Čavojová et al., 2024; Zhu et al., 2021)。一項越南的研究表明，集體主義提升了人們對抗虛假資訊的積極性，因為人們希望通過減少虛假資訊對他人的傷害進而維護社會的安定團結 (Rohman, 2022)。

集體主義強調集體責任感和共同命運，將群體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集體主義傾向強的個人通常將自己視為組織公民，更關心社會

趨近－迴避框架下的虛假健康資訊應對

與他人，表現出更多的親社會行為與利他行為 (Finkelstein, 2010, 2012, 2014)。中國社會被認為是高度集體主義和群體導向的社會 (Su et al., 2021)，強調「我們」的身分高於「我」的身分、群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群體需求先於個人欲望與需求 (Ting-Toomey & Dorjee, 2018)。無論是「指揮－控制」(command and control; Ning et al., 2020) 的防疫政策抑或是文化價值觀，集體主義作為「一種將集體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的心理傾向」(Hofstede & Bond, 1984; Pian et al., 2019)，是理解中國社會中個體社會行為抉擇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 (Oyserman et al., 2002)。有鑒於此，我們推測在媒介使用與虛假訊息應對行為之間的中介效應可能會受到集體主義的調節。

假設5：集體主義調節了醫學生對於虛假資訊的感知威脅對綜合社交媒體使用與主動對抗行為這一中介機制的後半路徑，即集體主義水平越高，感知威脅對虛假資訊的主動對抗的預測力越強。

假設6：集體主義調節了醫學生對於虛假資訊的感知效能對醫學資訊網站使用與主動對抗行為這一中介機制的後半路徑，即集體主義水平越高，感知效能對虛假資訊的主動對抗行為的預測力越強。

研究方法

抽樣和資料收集

2022年4月，我們對華中地區某大學醫學院的1,500名醫學生進行了線下問卷調查。我們分別從該醫學院的基礎醫學、臨床醫學、護理學和公共衛生四個專業中挑選並培訓了四名協調員協助收集資料。協調員在各專業定期舉行的內部大會上向學生發放調查問卷，以試圖覆蓋不同培養階段(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受訪者。問卷填寫耗時約10至15分鐘。最終共有1,483名受訪者完成了調查，回應率為86.53%。

在有效樣本中，42.20%為男性，57.80%為女性。受訪者的平均年齡為22歲($SD = 0.49$)，最小的17歲，最大的40歲。70.43%的受訪者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72 期（2025）

表一 樣本的人口統計學特徵

人口統計學特徵	樣本數	百分比
性別 (N = 1,479)		
女性	855	57.81%
男性	624	42.19%
培養階段 (N = 1,478)		
本科生	1,041	70.43%
碩士生	291	19.69%
博士生	146	9.88%
實習 (或見習) 時長 (N = 1,476)		
從未實習過	356	24.12%
半年及以內	450	30.49%
半年以上，一年半及以內	415	28.12%
一年半以上，三年及以內	228	15.44%
三年以上	27	1.83%
專業 (N = 1,483)		
基礎醫學	387	26.10%
臨床醫學	390	26.30%
護理學	307	20.70%
公共衛生	399	26.90%

是本科生，碩士生佔 19.69%，博士生佔 9.88%。樣本的人口統計學特徵見表一。

變項測量

與新冠疫情相關的綜合社交媒體使用：我們採用七分量表測量受訪者通過微博、微信和 QQ 三種綜合型社交媒體接觸新冠疫情資訊的頻率（從「從不」=1 分，到「總是」=7 分）。

與新冠疫情相關的醫學社交媒體使用：我們採用了七分量表測量受訪者在醫學資訊網站（如梅斯醫學、PubMed 等）或線上醫學論壇（如丁香園）接觸新冠疫情資訊的頻率（從「從不」=1 分，到「總是」=7 分）。兩個題項之間具有顯著相關性 ($r = .66, p < .001$)。

關於虛假資訊的感知威脅：我們使用了改編自Yang和Horning (2020)和Liu和Huang (2020)的四個題項測量受訪者對新冠疫情相關虛假資訊的威脅感知狀況。受訪者需要回答對於以下論述的同意程度(從「完全不同意」=1分，到「完全同意」=7分)：(1)我常常很難判斷自己在社交媒體上看到的新冠疫情相關資訊是真還是假；(2)我常常擔心自己在媒體上看到的新冠疫情相關資訊可能是錯誤的；(3)我認為自己會被媒體上的疫情相關虛假資訊誤導；(4)我認為自己的決策會被媒體上的疫情相關虛假資訊干擾。

應對虛假資訊的感知效能：我們使用了改編自Norman和Skinner (2006)的三個題項測量受訪者應對新冠疫情相關虛假資訊的效能感知狀況。受訪者需要回答對於以下論述的同意程度(從「完全不同意」=1分，到「完全同意」=7分)：(1)我知道如何借助線上工具(如騰訊事實核查平台、中國互聯網聯合闢謠平台等)識別新冠疫情相關虛假資訊；(2)我認為自己有能力糾正新冠疫情相關虛假資訊；(3)我認為自己能夠在社交媒體上分享正確的新冠疫情相關資訊。

集體主義：為了測量集體主義傾向(Yoo et al., 2011; Zhu et al., 2021)，受訪者需要回答對於以下論述的同意程度(從「完全不同意」=1分，到「完全同意」=7分)：(1)人們應該為了群體犧牲個體利益；(2)群體利益比個人利益更重要；(3)群體成功比個人成功更重要；(4)個人只有在考慮了群體利益之後才能追求個人利益；(5)哪怕個人利益受損，也應該保持對群體的忠誠。

對虛假資訊的主動對抗行為：我們使用了從過往研究中改編的三個題項(Tandoc et al., 2020)測量受訪者對新冠疫情相關虛假資訊的主動對抗行為狀況。具體測量方法是請受訪者回答他們在社交媒體上遇到虛假資訊時的應對狀況(從「一定不會」=1分，到「一定會」=7分)：(1)我會在這條虛假資訊下發表評論，指出該資訊是錯誤的；(2)我會給發佈這條虛假資訊的使用者發私信，告訴他該資訊是錯誤的；(3)我會在自己的社交媒體帳號上發佈正確的資訊。

對虛假資訊的被動防禦行為：測量被動防禦行為的兩個題項改編自過往研究(Howell & Shepperd, 2016; Yang & Kahlor, 2013)。我們請受訪者回答他們在社交媒體上遇到虛假資訊時的應對狀況(從「一定不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2期（2025）

會」=1分，到「一定會」=7分）：（1）我會無視這條虛假資訊；（2）我會取消關注發佈這條虛假資訊的使用者。兩個題項之間具有顯著相關性($r = .15, p < .001$)。

控制變項：此外，本研究的控制變項包括性別、培養階段（1=本科生；2=碩士生；3=博士生）和臨床實習（或見習）時長（0=未參加過；1=半年及以內；2=半年以上，一年半及以內；3=一年半以上，三年及以內；4=三年以上）。過往研究表明，這些人口統計學變項與個人應對虛假資訊的態度和行為密切相關（Chen et al., 2015; Vraga & Bode, 2017）。

數據分析

統計方法

假設1與2通過SPSS 23.0軟體中的階層迴歸分析進行驗證。通過Hayes (2013) PROCESS macro程式中的模型4檢驗假設3與4，即感知威脅與感知效能對於媒體使用與虛假資訊應對行為關係之間的中介效應是否成立。此外，通過Hayes (2013) PROCESS macro的模型14檢驗假設5與6，即感知威脅與感知效能對媒體使用與主動對抗虛假資訊關係之間的中介效應是否受到集體主義的調節。所有的數據分析均將性別、培養階段、臨床見習時長作為控制變項納入研究。

信效度分析

為了檢驗測量模型，我們考察了組合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 和平均提取方差值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詳情見表二。組合信度從.72到.91，超過了Fornell和Bookstein (1982)推薦的.70的水準，證實了內部一致性。AVE估計值從.51到.68不等，超過了Fornell和Larcker (1981)建議的.50的下限，支持收斂性。表二還顯示，AVE的所有平方根都大於相應行和列的非對角線相關值 (Fornell & Larcker, 1981)，區別效度得到了保證。綜上，測量模型顯示了足夠的收斂性和有效性。

趨近－迴避框架下的虛假健康資訊應對

表二 組合信度、AVE、平均值和相關性

	CR	AVE	M (SD)	綜合社交 媒體	醫學資訊 網站	感知 威脅	感知 效能	集體 主義	主動 對抗	被動 防禦
綜合社交媒體	.72	.51	4.53 (1.49)	.71						
醫學資訊網站	-	-	3.30 (1.54)	.28***	-					
感知威脅	.89	.68	3.92 (1.44)	.14***	.02	.82				
感知效能	.77	.53	4.38 (1.19)	.18***	.22***	-.02	.73			
集體主義	.91	.67	4.46 (1.28)	.14***	.08**	.04	.26***	.82		
主動對抗	.76	.52	4.07 (1.40)	.14***	.20***	.11***	.30***	.23***	.72	
被動防禦	-	-	4.85 (1.29)	.11***	.07**	.10***	.18***	.15***	.24***	-

註：CR：組合信度；AVE：平均提取方差值；M：平均值；SD：標準差；* $p < .05$ ；** $p < .01$ ；*** $p < .001$

媒體使用對感知威脅與感知效能的直接影響

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表三），綜合社交媒體使用對虛假資訊的感知威脅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beta = .14, p < .001$ ），而醫學資訊網站使用和感知威脅之間的關聯（ $\beta = -.01, p > .05$ ）是負相關且不顯著的。此外，本研究通過Cohen與Cohen（1983）的方法，檢驗兩個迴歸係數之間的差異是否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結果顯示，在對於感知威脅的預測力方面，綜合社交媒體使用和醫學資訊網站使用beta值之間的差異非常顯著（ $t = 4.06, p < .001$ ）。也就是說，與新冠疫情有關的綜合社交媒體使用比醫學資訊網站使用更能正向預測有關虛假資訊的感知威脅，假設1因此獲得支持。

迴歸分析的結果還顯示，綜合社交媒體使用（ $\beta = .11, p < .001$ ）和醫學資訊網站使用（ $\beta = .13, p < .001$ ）都與感知效能有正向且顯著的關聯。通過Cohen與Cohen（1983）的方法，檢驗兩個迴歸係數之間的差異並未達到顯著水準（ $t = 0.59, p > .05$ ）。換言之，與新冠疫情有關的綜合社交媒體使用與醫學資訊網站使用對於感知效能的正向預測力之間並不存在顯著差異，因此假設2沒有獲得支持。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72 期（2025）

表三 預測感知威脅與感知效能階層迴歸分析

自變項	感知威脅	感知效能
第一階層		
性別	.03 (.08)	.06 (.06)
培養階段	-.13* (.06)	-.10* (.05)
臨床見習時長	.02 (.04)	.01 (.03)
Adjusted R ²	0.10%	1.20%
第二階層		
綜合社交媒體使用	.14*** (.03)	.11*** (.02)
醫學資訊網站使用	-.01 (.03)	.13*** (.02)
Total adjusted R ²	1.90%	6.60%

註：N = 1,442；表格中 β 係數為所有變項均輸入迴歸方程式後的最終非標準化迴歸係數，括號中數字為標準誤 (SE)；*** $p < .001$ ；** $p < .01$ ；* $p < .05$

感知威脅與感知效能的中介作用

表四顯示，感知威脅在綜合社交媒體使用與對虛假資訊的被動防禦之間具有顯著的中介作用 ($\beta = .010$, 95% CI = [0.004, 0.020])，與此同時，感知威脅在綜合社交媒體使用和主動對抗之間的中介效應也顯著 ($\beta = .012$, 95% CI = [0.004, 0.022])。因此，假設 3a 與 3b 均獲得支持。

中介分析結果還顯示，感知效能醫學資訊網站使用與主動對抗之間的中介效應達到顯著水準 ($\beta = 0.052$, 95% CI = [0.037, 0.072])。假設 4 因此獲得支持。

表四 感知威脅與感知效能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

	N	Effect	95% CI	
			LLCI	ULCI
綜合社交媒體使用對虛假資訊應對行為的間接影響				
綜合社交媒體使用 → 感知威脅 → 被動防禦	1,450	.010	0.004	0.020
綜合社交媒體使用 → 感知威脅 → 主動對抗	1,447	.012	0.004	0.022
醫學資訊網站使用對虛假資訊應對行為的間接影響				
醫學資訊網站使用 → 感知效能 → 主動對抗	1,440	.052	0.037	0.072

註：係數已作標準化處理；CI = 置信區間

調節中介效應

通過 Hayes (2013) PROCESS macro 的模型 14，本研究繼續檢驗在感知威脅與感知效能的中介效應下，集體主義的調節效應是否成立。取集體主義的平均值、低於一個標準差以及高於一個標準差的分數進行自抽樣 (bootstrap) 檢驗，結果顯示在感知威脅對綜合社交媒體使用與虛假資訊主動對抗行為關係之間的中介效應下，集體主義的調節效應並不顯著 ($b = -.003, SE = .003, 95\% CI = [-.009, .003]$)，因為 95% 的置信區間跨過了零。假設 5 因此沒有獲得支持。

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結果還顯示，在感知效能對醫學社交媒體使用與虛假資訊主動對抗行為關係之間的中介效應下，集體主義的調節效應也不顯著 ($b = .002, SE = .004, 95\% CI = [-.005, .010]$)。因此，假設 6 也沒有獲得支持。

表五 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

因變項	自變項	擬合指標			係數顯著性	
		<i>R</i>	<i>R</i> ²	<i>F</i> (<i>df</i>)	<i>Beta</i>	<i>t</i>
主動對抗	綜合社交媒體使用				.03	1.04
	醫學資訊網站使用				.13***	4.96
	感知威脅				.17*	2.13
	感知效能	0.39	0.15	36.02 (7)	.19**	2.57
	集體主義				.17	1.67
	感知威脅*集體主義				-.09	-.93
	感知效能*集體主義				.07	.56

結論與討論

社交媒體中滋蔓難除的虛假資訊會造成不良社會後果，訊息鴻溝及數字不平等會進一步加劇疫情後社會中的健康差距，弱勢群體面臨的訊息流行病導致的感染風險與健康損害將更加嚴重 (Lin et al., 2022)。因此，對氾濫的虛假資訊進行治理是迫切而必要的 (Liu & Huang, 2020; Yang & Tian, 2021)。本研究對於如何動員醫學生群體——具備高於平均水準醫學知識的「Z 世代」——參與對抗社交媒體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2期（2025）

中的虛假健康資訊的機制路徑進行了深入探究。研究發現，與新冠疫情相關的綜合社交媒體使用和醫學資訊網站使用會對醫學生與虛假資訊相關的感知威脅與感知效能產生不同影響；不同感知又會驅動醫學生採取不同的虛假資訊應對策略——主動對抗或被動防禦，這意味著通過恰當的媒介干預策略進行打擊虛假資訊的動員、激勵與調節能夠產生更理想的治理效果。

與假設一致，綜合社交媒體使用比醫學資訊網站使用更能正向預測與虛假資訊相關的感知威脅。但兩種媒介使用對於感知效能的正向預測力並沒有顯著差異。公共衛生危機期間，社會化媒體大大增加了人們對疫情相關訊息的接觸機會（金兼斌等，2023）。民眾對健康議題關注佔據新聞頭條，社交媒體較之以往大量引用和轉載醫學資訊網站上的相關資訊，為公眾更好地學習防護技能、獲取健康方面的知識提供平台（Ghalavand et al., 2022）。這一特殊時期，醫學生從社交媒體與醫學資訊網站均能獲取有用的醫學資訊及事實核查資源（Niu et al., 2021）。因此，社交媒體與醫學資訊網站上關於醫學訊息的鴻溝較之平常明顯縮小，兩種媒介使用均對提升感知效能有顯著正向效果。

研究表明，綜合社交媒體使用通過增強醫學生與虛假資訊相關的感知威脅，既可以驅使其主動對抗虛假資訊，亦可能觸發其對於虛假資訊的迴避行為。社交媒體的巨大優勢從某種程度上被稱之為醫學知識傳播的巨大威脅（Sharma & Hasija, 2022）。社交媒體將更多的虛假健康訊息映入醫學生的眼簾，這有可能加劇他們感知到的威脅「無處不在」以及個體的「無能為力」，從而採取迴避行為（Deline & Kahlor, 2019）；也會突顯傳染病造成的疾苦與傷亡從而推動醫學生挺身而出參與打擊治理（Sun & Ma, 2023）。當虛假訊息與流行病一樣由社會感染（social contagion）衍生傳播（Kucharski, 2016），醫學生同時處於雙重洪流交匯中，疫情傳播的烈度、工作壓力的境況、集體的境遇以及個體面對的挑戰均會導致不同應對行為的選擇。

研究結果還顯示，集體主義對於媒介使用與虛假訊息應對行為之間中介效應的調節作用並不顯著。既有研究發現了集體主義在波及健康行為的勸服中體現出積極作用，例如疫苗接種、政府建議的防疫行為採納（Li et al., 2019）；但積極主動的虛假健康資訊應對，通常被

認為是依靠「自律」(code of practice on disinformation;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2022)或憑藉「同情心」達成(Sun & Ma, 2023)。另一方面，集體主義對於利他行為的促進更多發生在當個體意識到「他人」或者社會弱勢群體更易受到傷害時。例如，疫情期間的研究發現，當受訪者認為「他人」更易感染新冠時，集體主義會促使受訪者伸出援助之手，為他人提供信息支持與物質資源(Zhu et al., 2021)。也就是說，集體主義對於集體層面的感知威脅與利他行為關係之間的調節作用是顯著的，但個體層面的威脅感知與集體主義之間的交互作用不一定能促進利他行為的實現。

囿於調查開展條件的局限，特別是疫情存續期間的環境和政策限制，本研究仍有可以改善的空間。首先，本研究是通過橫截面調查考察了各變項之間的關聯，雖然可以較完整地回應研究主題，但只展示了變項間的相關性，並未揭示變項之間的因果關聯，期待未來能通過縱向研究或實驗方法建立並驗證因果機制。

第二，本研究的部分測量存在局限性。例如，我們對於「綜合社交媒體使用」的測量是將受訪者使用微博、微信與QQ接觸新冠疫情相關資訊的頻率進行粗略地加總計算。事實上，這三種社交媒體的核心功能與用戶使用模式存在顯著差異，不可一概而論。因此，未來的研究有必要對社交媒體使用進行更為細緻的區分與界定，以縮小測量誤差。

第三，本研究探討了媒介使用觸發的不同感知對虛假資訊應對行為的影響機制，但不同感知之間的交互作用對應對行為的可能影響仍待進一步探索，特別是感知威脅和感知效能之間的互動是否以及如何影響虛假行為應對的主動與被動策略值得深究。正如EPPM模型(Witte, 1992)所示，威脅感知和效能感知的交互會成倍數級地影響行為取向，如高威脅感知/高效能感知會驅動適應性行為，而高威脅感知/低效能感知則會觸發非理性應對行為。未來針對不同感知交互效應的研究可能會有更加有趣與新穎的發現。

第四，本研究僅關注了個體層面的感知威脅與感知效能，並未對虛假資訊可能帶來的集體層面的威脅與效能展開測量。作為危及公眾健康與社會安定的公共難題，虛假資訊對群體層面，尤其是弱勢群體的危害，可能更易激發人們的保護動機與利他行為；與此同時，集體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2期（2025）

層面效能的「加持」，例如政府與平台治理措施的施行，也更能激發個體參與式治理的熱情。因此，未來的研究有必要將集體層面威脅與效能的感知納入考量，全面探究個體參與虛假資訊治理的心理動機。

最後，本研究的另一局限是研究結果的推論能力。我們以華中地區某大學醫學院的學生為研究對象展開調查，由於疫情接近性，本研究受訪者相較於其他地區醫學生可能有更高的疫情捲入度，因而呈現出特殊的行為模式。因此本研究的結果並不一定能推論至整個醫學生群體。未來的研究應通過系統抽樣的方式，把不同地區、不同類型醫學院校的學生納入考察範圍，才能提高樣本代表性，使研究結果更具普適價值。

本研究對虛假資訊相關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貢獻，並在實踐操作上為打擊虛假資訊提供了新的路徑。首先，本研究將趨近一迴避模型的應用擴展到了虛假資訊應對的場景中，區分了虛假訊息應對的不同行為抉擇路徑，這為訊息疫情治理和媒介效果研究都開拓了新的理論視角，管理者可以依據不同的目的設置介入的路徑和調節的靶點。

其次，我們的研究證實了綜合社交媒體和醫學資訊網站在塑造醫學生對虛假資訊的認知與影響其應對策略方面存在顯著差異。根據受訪者的身分特點，本研究將網絡媒體區分為綜合社交媒體和醫學資訊網站兩類，這與之前基於功能的分類（即以內容為導向與以使用者為導向的類型劃分；Yoo et al., 2020）有明顯區別。研究結果表明，醫學生的綜合社交媒體使用更有可能強化感知威脅，而醫學資訊網站與綜合社交媒體使用均對增強感知效能具有顯著效果。這種分類和比較的方式可以為未來的健康傳播研究以及媒介效果研究提供新思路。例如在醫學教育和臨床實踐中，可通過專業性媒體這一路徑加強對醫學生知識促進的作用。

第三，本研究揭示了感知威脅與感知效能在促進積極抵制虛假資訊方面發揮著巨大作用。醫學資訊網站使用通過增強用戶的感知效能進而促進其對虛假資訊的積極抵抗：這些訊息「激發同情和支持其干預行為」（Cottle & Rai, 2006），為主動抵抗虛假資訊的行動提供了信念支援。此外，社交媒體使用通過增強用戶的感知威脅亦能促進其主動對抗虛假資訊，也就是說，適當的威脅與風險感知可以激發個體正面、

趨近－迴避框架下的虛假健康資訊應對

積極的行為取向。這是本研究一個意猶未盡的「長尾發現」。既然感知威脅與感知效能均被證實可能觸發醫學生的主動抵抗行為，那麼如何在不同的傳播情境與媒介空間中有針對性地設置節點，特別是例如單一策略、組合策略的差異化運用是否會在動員醫學生參與虛假健康資訊的治理中體現出差異化結果，是值得繼續探索和研究的課題。

在網絡空間中相互矛盾的科學訊息激增的情況下，優質的社交媒體實踐成為傳遞準確科學訊息的必經之路 (Bode et al., 2021; Lee, 2020; Lee & Bissell, 2023)。我們的研究致力於動員社會潛在力量特別是「Z世代」參與共同抵抗虛假資訊，並推動數位社會中良好傳播秩序的構建：而感知威脅與感知效能均有望成為驅動虛假資訊糾正行為的強大動能，這在過往研究中曾有草蛇灰線 (Malik et al., 2023) 並已經在為未來的研究構築基石。這些研究發現甚至可以在更廣闊的交叉研究視域中為全健康 (one health) 和協同治理的實現提供幫助，例如探索和挖掘醫學教育中的集體主義觀念培養和塑造的適用空間、豐富潛質和多元效能；而趨近－迴避模型的引入、運用與探索，不僅為虛假資訊的研究拓展了另闢蹊徑的理論視野，還為虛假資訊應對提供了豁然開朗的實踐路徑：例如在機器學習、情緒識別和算法推薦等智能傳播語境中，管理者可以據此來實現更為「對症下藥」的虛假訊息治理結果。

披露聲明

本文作者未報告潛在的利益衝突。

Disclosure Statement

No potential conflict of interest was reported by the authors.

研究經費資助

本文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敘事醫學視域下的平行病歷及其健康傳播潛能探索 (24BXW072)」項目資助。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 72 期（2025）

Funding

This article was funded by the 2024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24BXW072).

ORCID

閻雋 (Jun YAN) <https://orcid.org/0000-0002-9539-8466>

李宗亞 (Zongya LI) <https://orcid.org/0000-0002-4479-5971>

莫凡 (Fan MO) N/A

武丹萍 (Danping WU) N/A

周雨萌 (Yumeng ZHOU) N/A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金兼斌、魏然、郭靖 (2023)。〈疫情虛假信息如何影響公眾的疫苗接種態度：基於北京市的實證研究〉。《傳播與社會學刊》，第 63 期，頁 239–267。

Jin, J., Wei, R., & Guo, J. (2023).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exposure to COVID-19 misinformation on vaccine hesitancy among Beijing resident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63, 239–267.

陳憶寧 (2023)。〈新冠疫情中虛假資訊的議題設定：從社群媒體到傳統媒體〉。《傳播與社會學刊》，第 63 期，頁 101–133。

Chen, Y.-N. K. (2023). Agenda setting and COVID-19: Misinformation from social network sites to traditional media.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63, 101–133.

魏然、郭靖、王賽、黃懿慧 (2022)。〈新冠肺炎虛假資訊接觸對認知和態度的負面影響：探究數字媒體資訊近用性的形塑作用〉。《傳播與社會學刊》，第 62 期，頁 207–264。

Wei, R., Guo, J., Wang, S., & Y.-H. C. Huang (2022). The role of digital information accessibility in shaping the relationships of exposure to COVID-19 misinformation and cognitive and attitudinal effects in Asia.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62, 207–264.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Abbas, J., Wang, D., Su, Z., & Ziapour, A. (2021).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in the advent of COVID-19 pandemic: Crisis management, mental health 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 *Risk Management and Healthcare Policy*, 14, 1917–1932.
- Bandura, A. (2001).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An agentic per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2(1), 1–26.
- Bode, L., Vraga, E. K., & Tully, M. (2021). Correcting misperceptions about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on social media: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experts, social media heuristics, and the gateway belief model. *Science Communication*, 43(2), 225–251.
- Brewer, N. T., Chapman, G. B., Gibbons, F. X., Gerrard, M., McCaul, K. D., & Weinstein, N. D. (2007). Meta-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perception and health behavior: The example of vaccination. *Health Psychology*, 26(2), 136–145.
- Bautista, J. R., Zhang, Y., & Gwizdka, J. (2022a). Predicting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intention to correct health misinformation on social media.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73, 101864.
- Bautista, J. R., Zhang Y., & Gwizdka J. (2022b).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perceived crisis severity as antecedents of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responses to health misinformation on social media. In M. Smits (ed.), *Information for a better world: Shaping the global future. Proceedings of iConference 2022*. (pp. 273–291). Springer, Cham.
- Čavojová, V., Adamus, M., & Ballová Mikušková, E. (2024). You before me: How vertical collectivism and feelings of threat predicted more socially desirable behaviour during COVID-19 pandemic. *Current Psychology*, 43(9), 8303–8314.
- Chae, J., & Lee, C. J. (2019).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underlying communication effects on behavioral intention: Focusing on affect and cognition in the cancer contex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6(5), 597–618.
- Chaffee, S. H., & Roser, C. (1986). Involvement and the consistency of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3(3), 373–399.
- Chen, L., & Tang, H. (2023). Intention of health experts to counter health misinformation in social media: Effects of perceived threat to online users, correction efficacy, and self-affirmation.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32(3), 284–303.
- Chen, X., Sin, S.-C. J., Theng, Y.-L., & Lee, C. S. (2015). Why students share misinformation on social media: Motivation, gender, and study-level differences. *The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anship*, 41(5), 583–592.
- Chi, X., Cai, G., & Han, H. (2021). Festival travellers' pro-social and protective behaviours against COVID-19 in the time of pandemic.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4(22), 3256–3270.

- Coelho, C. M., Suttiwan, P., Arato, N., & Zsido, A. N. (2020). On the nature of fear and anxiety triggered by COVID-19.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1, 581314.
- Cohen, J., & Cohen, P. (1983). *Applied multiple regression/correlation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Lawrence Erlbaum.
- Cottle, S., & Rai, M. (2006). Between display and deliberation: Analyzing TV news as communicative architectur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8(2), 163–189.
- Dai, B., Ali, A., & Wang, H. (2020). Exploring information avoidance intention of social media users: A cognition-affect-conation perspective. *Internet Research*, 30(5), 1455–1478.
- de Bruin, K., de Haan, Y., Vliegenthart, R., Kruijemeier, S., & Boukes, M. (2021). News avoidance during the COVID-19 crisis: Understanding information overload. *Digital Journalism*, 9(9), 1286–1302.
- Deline, M. B., & Kahlor, L. A. (2019). Planned risk information avoidance: A proposed theoretical model. *Communication Theory*, 29(3), 360–382.
- Denecke, K. (2015). Content and language in medical social media. In K. Denecke (Ed.), *Health web science: Social media data for health care* (pp. 33–47). Springer.
- Denecke, K., & Nejd, W. (2009). How valuable is medical social media dat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medical web. *Information Sciences*, 179(12), 1870–1880.
- Finkelstein, M. A. (2010).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Implications for the volunteer process.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38(4), 445–452.
- Finkelstein, M. A. (2012).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40(10), 1633–1644.
- Finkelstein, M. A. (2014).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OCB: The contributions of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4(1), 1–8.
- Fornell, C., & Bookstein, F. L. (1982). Two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LISREL and PLS applied to consumer exit-voice theory.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4), 440–452.
- Fornell, C., & Larcker, D. F. (1981).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8(1), 39–50.
- Frisch, M., Chaudhary, W., Zhang, X., Parkas, V., & Forsyth, B. (2022). Addressing COVID-19 vaccine hesitancy: The role of medical students. *Medical Science Educator*, 32(6), 1299–1303.
- Gan, Y., & Fu, Q. (2022). Risk perception and coping response to COVID-19 mediated by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s: A study on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PLOS One*, 17(1), e0262161.

趨近－迴避框架下的虛假健康資訊應對

- Gerbner, G., Gross, L., Morgan, M., Signorielli, N., & Shanahan, J. (2002). Growing up with television: Cultivation processes. In J. Bryant & D. Zillmann (Eds.), *Media effects: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2nd ed.) (pp. 53–78). Routledge.
- Ghalavand, H., Panahi, S., & Sedghi, S. (2022). How social media facilitate health knowledge sharing among physicians. *Behaviour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41(7), 1544–1553.
- Gidado, S., Musa, M., Ba’aba, A. I., Francis, M. R., Okeke, L. A., Bukar, F. L., ... & Atkins, S. (2024). Knowledge, risk perception and uptake of COVID-19 vaccination among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 in complex humanitarian emergency setting, Northeast Nigeria. *BMC Public Health*, 24(1), 634
- Goodall, C. E., & Reed, P. (2013). Threat and efficacy uncertainty in news coverage about bed bugs as unique predictors of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avoidance: An extension of the EPPM. *Health Communication*, 28(1), 63–71.
- Grindrod, K., Forgione, A., Tsuyuki, R. T., Gavura, S., & Giustini, D. (2014). Pharmacy 2.0: A scoping review of social media use in pharmacy. *Research in Social & Administrative Pharmacy*, 10(1), 256–270.
- Han, P. K. J., Zikmund-Fisher, B. J., Duarte, C. W., Knaus, M., Black, A., Scherer, A. M., & Fagerlin, A. (2018). Communication of scientific uncertainty about a novel pandemic health threat: Ambiguity aversion and its mechanisms.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23(5), 435–444.
- Hayes, A. F. (2013).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Guilford.
- Hofmann, S. G., & Hay, A. C. (2018). Rethinking avoidance: Toward a balanced approach to avoidance in treating anxiety disorders.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55, 14–21.
- Hofstede, G., & Bond, M. H. (1984). Hofstede’s culture dimensions: An independent validation using Rokeach’s value survey.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5(4), 417–433.
- Howell, J. L., & Shepperd, J. A. (2016). Establishing an information avoidance scal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8(12), 1695–1708.
- Hwang, J., Kim, W., & Kim, J. J. (2020). Application of the value-belief-norm model to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drone food delivery servi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32(5), 1775–1794.
- Ismail, H., Hussein, N., Elabyad, R., Abdelhalim, S., & Elhadeif, M. (2023). Aspect-based classification of vaccine misinformation: A spatiotemporal analysis using Twitter chatter. *BMC Public Health*, 23(1), 1193.
- Jo, H., Yang, F., & Yan, Q. (2022). Spreaders vs victims: The nuanced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 and misinformation via FoMO and digital literacy in different cultures. *New Media & Society*, 26(9), 5169–5194.

- Kelly, L., Kerr, G., & Drennan, J. (2020). Triggers of engagement and avoidance: Applying approach-avoid theory. *Journal of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26(5), 488–508.
- Kim, B., Cooks, E., & Kim, Y. (2022). Thinking, checking and learning: Testing a moderated-mediation model of social media news use conditional upon elaboration on political knowledge via fact-checking. *Online Information Review*, 46(5), 920–936.
- Kim, H. K., Ahn, J., Atkinson, L., & Kahlor, L. A. (2020). Effects of COVID-19 misinformation on information seeking, avoidance, and processing: A multicountry comparative study. *Science Communication*, 42(5), 586–615.
- Kim, J. N., Oh, Y. W., & Krishna, A. (2018). Justificatory information forefending in digital age: Self-sealing informational conviction of risky health behavior. *Health Communication*, 33(1), 85–93.
- Koo, A. Z. X., Su, M. H., Lee, S., Ahn, S. Y., & Rojas, H. (2021). What motivates people to correct misinformation?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third-person perceptions and perceived norm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65(1), 111–134.
- Koskan, A. M., Teeter, B. S., Daniel, C. L., LoCoco, I. E., Jensen, U. T., & Ayers, S. L. (2024). U.S. adults' reasons for changing their degree of willingness to vaccinate against COVID-19. *Zeitschrift für Gesundheitswissenschafte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32, 355–367.
- Krause, N. M., Freiling, I., Beets, B., & Brossard, D. (2020). Fact-checking as risk communication: The multi-layered risk of misinformation in times of COVID-19.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23(7–8), 1052–1059.
- Krieger, J. L., & Sarge, M. A. (2013). A serial mediation model of message framing on intentions to receive the human papillomavirus (HPV) vaccine: Revisiting the role of threat and efficacy perceptions. *Health Communication*, 28(1), 5–19.
- Kucharski, A. (2016). Study epidemiology of fake news. *Nature*, 540(7634), 525.
- Lee, J. (2022). The effect of web add-on correction and narrative correction on belief in misinformation depending on motivations for using social media. *Behaviour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41(3), 629–643.
- Lee, J., & Bissell, K. (2024). User agency-based versus machine agency-based misinformation interventions: The effects of commenting and AI fact-checking labeling on attitudes toward the COVID-19 vaccination. *New Media & Society*, 26(12), 6817–6837.
- Li, K. K., Chan, M. W. H., Lee, S. S., & Kwok, K. O. (2019). The mediating roles of social benefits and social influence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llectivism, power distance, and influenza vaccination among Hong Kong nurse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Studies*, 99, 103359.

- Lin, F., Chen, X., & Cheng, E. W. (2022). Contextualized impacts of an infodemic on vaccine hesitancy: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ocioeconomic and cultural factor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 59(5), 103013.
- Lin, H., Chen, M., Yun, Q., Zhang, L., & Chang, C. (2022). 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and smoking quitting intention: Findings based 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and mediation analysis. *BMC Public Health*, 22, 838.
- Liu, M., Chen, Y., Shi, D., & Yan, T. (2021). The public's 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avoidance in China during early stages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2, 649180.
- Liu, P. L., & Huang, L. V. (2020). Digital disinformation about COVID-19 and the third-person effect: Examining the channel differences and negative emotional outcomes.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23(11), 789–793.
- Maaravi, Y., Levy, A., Gur, T., Confino, D., & Segal, S. (2021).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How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affected the spread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9, 627559.
- MacIntyre, P. D., Gregersen, T., & Mercer, S. (2020). Language teachers' coping strategies during the COVID-19 conversion to online teaching: Correlations with stress, wellbeing and negative emotions. *System*, 94, 102352.
- Mahmood, Q. K., Jafree, S. R., Mukhtar, S., & Fischer, F. (2021). Social media use, self-efficacy, perceived threat, and preventive behavior in times of COVID-19: Results of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Pakista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2, 562042.
- Malik, A., Islam, T., & Mahmood, K. (2023). Factors affecting misinformation combating intention in Pakistan during COVID-19. *Kybernetes*, 52(12), 5753–5775.
- Moorhead, S. A., Hazlett, D. E., Harrison, L., Carroll, J. K., Irwin, A., & Hoving, C. (2013). A new dimension of health care: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uses, benefits, and limitations of social media for health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15(4), e85.
- Motta Zanin, G., Gentile, E., Parisi, A., & Spasiano, D. (2020). A preliminary evaluation of the public risk perception related to the COVID-19 health emergency in Ital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7(9), 3024.
- Muhlmann, G. (2008). *A political history of journalism*. Polity.
- Negi, A. R. (2021). Novel coronavirus (COVID 19) knowledge and perception: A survey of healthcare workers. *Asian Journal of Nurs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11(4), 503–509.
- Ning, L., Niu, J., Bi, X., Yang, C., Liu, Z., Wu, Q., Ning, N., Liang, L., Liu A., Hao, Y., Gao, L., & Liu, C. (2020). The impacts of knowledge, risk perception, emotion and information on citizens' protective behaviors during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China. *BMC Public Health*, 20, 1751.

- Niu, Z., Willoughby, J., & Zhou, R. (2021). Associations of health literacy, social media use, and self-efficacy with health information-seeking intentions among social media users in China: Cross-sectional survey.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23(2), e19134.
- Norman, C. D., & Skinner, H. A. (2006). eHEALS: The eHealth literacy scale.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8(4), e27.
- Oyserman, D., Coon, H. M., & Kemmelmeier, M. (2002). Rethinking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Evaluation of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and meta-analys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8(1), 3–72.
- Park, C. S. (2019). Does too much news on social media discourage news seeking? Mediating role of news efficacy between perceived news overload and news avoidance on social media. *Social Media + Society*, 5(3), 1–12.
- Pian, Q. Y., Jin, H., & Li, H. (2019). Linking knowledge sharing to innovative behavior: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llectivism.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23(8), 1652–1672.
- Passemard, S., Faye, A., Dubertret, C., Peyre, H., Vorms, C., Boimare, V., Auvin, S., Flamant, M., Ruszniewski, P., & Ricard, J. D. (2021). COVID-19 crisis impact on the next generation of physicians: A survey of 800 medical students. *BMC Medical Education*, 21, 1–13.
- Patte, K. A., Wade, T. J., MacNeil, A. J., Bélanger, R. E., Duncan, M. J., Riazi, N., & Leatherdale, S. T. (2022). Support for mask use as a COVID-19 public health measure among a large sample of Canadian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BMC Public Health*, 22, 1598.
- Rocha, Y. M., de Moura, G. A., Desidério, G. A., de Oliveira, C. H., Lourenço, F. D., & de Figueiredo Nicolete, L. D. (2021). The impact of fake news on social media and its influence on health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 systematic review. *Zeitschrift für Gesundheitswissenschafte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 1–10.
- Rodgers, K., & Massac, N. (2020). Misinformation: A threat to the public's health and the public health system.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Management and Practice*, 26(3), 294–296.
- Rogers, R. W. (1975). A 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of fear appeals and attitude change.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91(1), 93–114.
- Rohman, A. (2022). Hybrid self-repairs in everyday misinformation shar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6, 1220–1238.
- Roth, S., & Cohen, L. J. (1986). Approach, avoidance, and coping with stres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1(7), 813–819.
- Schneider, C. R., Dryhurst, S., Kerr, J., Freeman, A. L. J., Recchia, G., Spiegelhalter, D., & van der Linden, S. (2021). COVID-19 risk perception: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its predictors and associations with health protective behaviours in the United Kingdom.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24(3–4), 294–313.

趨近－迴避框架下的虛假健康資訊應對

- Sharma, A., & Hasija, Y. (2022). Misinformation—A challenge to medical sciences: A systematic review. In R. Misra, R. K. Shyamasundar, A. Chaturvedi, & R. Omer (Eds.), *Machine learning and big data analytics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 and Big Data Analytics[ICMLBDA] 2021)* (pp. 150–159). Springer.
- Song, S., Yao, X., & Wen, N. (2021). What motivates Chinese consumers to avoid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imulus-organism-response mode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 58(1), 102407.
- Song, H., So, J., Shim, M., Kim, J., Kim, E., & Lee, K. (2023). What message features influence the intention to share misinformation about COVID-19 on social media? The role of efficacy and novelty.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38, 107439.
- Su, Z., Zhou, Q., Ye, Y., & Li, D. (2021). How the media construct happiness under cultural perspective in China: Through collectivistic and individualistic value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102(6), 2619–2639.
- Sun, M., & Ma, X. (2023). Combating health misinformation on social media through fact-checking: The effect of threat appraisal, coping appraisal, and empathy.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84, 102031.
- Sweeny, K., Melnyk, D., Miller, W., & Shepperd, J. A. (2010). Information avoidance: Who, what, when, and why.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14(4), 340–353.
- Tandoc Jr, E. C., Lim, D., & Ling, R. (2020). Diffusion of disinformation: How social media users respond to fake news and why. *Journalism*, 21(3), 381–398.
- Tempski, P., Arantes-Costa, F. M., Kobayasi, R., Siqueira, M. A., Torsani, M. B., Amaro, B. Q. R. C., Nascimento, M. E. F. M., Siqueira, S. L., Santos, I. S., & Martins, M. A. (2021). Medical students' perceptions and motivation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PLOS One*, 16(3), e0248627.
-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2022). *2022 strengthened code of practice on disinformation*. European Union.
- Ting-Toomey, S., & Dorjee, T. (2018). *Communicating across cultures* (2nd ed.). Guilford Publications.
- Turner, A. (2015). Generation Z: Technology and social interest. *The Journal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 71(2), 103–113.
- Ventola, C. L. (2014). Social media and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Benefits, risks, and best practices. *Pharmacy and Therapeutics: A Peer-Reviewed Journal for Managed Care and Hospital Formulary Management*, 39(7), 491–520.
- Viswanath, K., Lee, E. W. J., & Pinnamaneni, R. (2020). We need the lens of equity in COVID-19 communication. *Health Communication*, 35(14), 1743–1746.
- Vraga, E. K., & Bode, L. (2017). Using expert sources to correct health misinformation in social media. *Science Communication*, 39(5), 621–645.

- Vraga, E. K., & Bode, L. (2020a). Correction as a solution for health misinformation on social media.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10*(S3), S278–S280.
- Vraga, E. K., & Bode, L. (2020b). Defining misinformation and understanding its bounded nature: Using expertise and evidence for describing misinform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37*(1), 136–144.
- Vraga, E. K., Bode, L., & Tully, M. (2022). Creating news literacy messages to enhance expert corrections of misinformation on Twitte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9*(2), 245–267.
- Vydiswaran, V. G. V., & Reddy, M. (2019). Identifying peer experts in online health forums. *BMC Medical Informa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19*(S3), 41–49.
- Wicks, P., Massagli, M., Frost, J., Brownstein, C., Okun, S., Vaughan, T., Bradley, R., & Heywood, J. (2010). Sharing health data for better outcomes on Patients Like Me.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12*(2), e19.
- Williams, D. (2021). Motivated ignorance, rationalit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Synthese, 198*, 7807–7827.
- Witte, K. (1992). Putting the fear back into fear appeals: The extended parallel process model. *Communications Monographs, 59*(4), 329–349.
- Xiao, X., Borah, P., & Su, Y. (2021). The dangers of blind trust: Examining the interplay among social media news use, misinform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news trust on conspiracy beliefs.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30*(8), 977–992.
- Yang, F., & Horning, M. (2020). Reluctant to share: How third person perceptions of fake news discourage news readers from sharing “real news” on social media. *Social media+ Society, 6*(3), 1–11.
- Yang, J., & Tian, Y. (2021). “Others are more vulnerable to fake news than I am”: Third-person effect of COVID-19 fake news on social media user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25*, 106950.
- Yang, J. Z., Liu, Z., & Wong, J. C. (2022).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0*(1), 1–21.
- Yang, Z. J., & Kahlor, L. (2013). What, me worry? The role of affect in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avoidance. *Science Communication, 35*(2), 189–212.
- Yoo, B., Donthu, N., & Lenartowicz, T. (2011). Measuring Hofstede’s five dimensions of cultural value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CVSC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nsumer Marketing, 23*(3–4), 193–210.
- Yoo, W., Paek, H., & Hove, T. (2020).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content-oriented versus user-oriented social media on risk perceptions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Health Communication, 35*(1), 99–109.
- Zhang, J., Featherstone, J. D., Calabrese, C., & Wojcieszak, M. (2021). Effects of fact-checking social media vaccine misinformation on attitudes toward vaccines. *Preventive Medicine, 145*, 106408.

趨近－迴避框架下的虛假健康資訊應對

- Zhao, L., Yin, J., & Song, Y. (2016). An exploration of rumor combating behavior on social media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crise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58, 25–36.
- Zhou, X., & Zafarani, R. (2020). A survey of fake news: Fundamental theories, detection methods, and opportunities. *ACM Computing Surveys (CSUR)*, 53(5), 1–40.
- Zhu, Y., Wei, R., Lo, V.-H., Zhang, M., & Li, Z. (2021). Collectivism and altruistic behavior: A third-person effect study of COVID-19 news among Wuhan residents. *Global Media and China*, 6(4), 476–491.

本文引用格式

閻雋、李宗亞、莫凡、武丹萍、周雨萌 (2025)。〈趨近－迴避框架下的虛假健康資訊應對：一項針對醫學生的調查研究〉。《傳播與社會學刊》，第72期，頁217–247。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Yan, J., Li, Z., Mo, F., Wu, D., & Zhou, Y. (2025). An approach-avoidance framework of coping with health-related misinformation: A survey of medical student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72, 217–247.